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雷铁崖集

唐文权 编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雷铁崖集

唐文权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铁崖集/唐文权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人物文集系列)

ISBN 978-7-5622-5130-9

I. ①雷… II. ①唐… III. ①政论—中国—1904—1915—文集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6205 号

雷 铁 崖 集

编者:唐文权 ①

责任编辑:王中宝

责任校对:易 雯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e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33.25

字数:521 千字

插页:10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96.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编辑说明

一、本集根据散见于《广益丛报》《鹃声》《四川》《民报》《夏声》《民声》《越报》《民主报》《南社丛刻》《国学丛选》以及南洋群岛《光华日报》《国民日报》等报刊上的雷氏撰著编辑而成。

二、本集编排诗文分列，各以时间先后为序。原作未署时日者，经考证鉴别，置于相应之处；暂难考订而发表于当时报刊者，按发表时间编排；连载数次刊毕者，按最先刊登月日编排；有年份无月日者，置于年末；有年月无日期者，置于月末。

三、本集各件，一律注明来源、发表刊期、作者署名。

四、本集各件，一律据初载时的原文录入，凡重刊时有改易者，则移入校注。个别报刊文字谑而不雅者，一仍其旧，以见原貌。

五、本集各件，一律采用原有标题，偶有原无标题者，则根据内容酌加，以*号注明。

六、本集各件，均予标点分段。作者原注，用（ ）标明；凡肯定误植者，后加〔 〕，凡肯定脱字者，后加〈 〉，并将正字、脱字注于〔 〕、〈 〉之中；凡衍文用【 】标出；凡缺字或原件难以辨认者，用□标出。凡原文未毕或残缺不全，均予注明。

七、《黄花岗烈士等传略十八篇》，为编者所辑，原件大多未署名，但作者与传略撰写一事大有关系；《〈民报〉续刊启》《〈民报〉续刊公函》和《重兴〈民报〉广告》未能肯定出自作者之手，但作者参与谋复《民报》当可无疑；《垦植协会蜀支部章程》和《蜀支部垦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也未能肯定出自作者之手，但作者时任该支部总务科长，“掌理公牍”。因上述各该件均有一定史料价值，

故系于书后，以供研究者参考。为方便读者，编者复撰《雷铁厓生平简明年表》，作为附录之一。

八、作者译作，本集不予收入。编者所见之译作有：署名耆皆译、刊于《远东闻见录》第一至三号（1907年7月—9月）的《亚细亚大陆诸国之将来》和《汉日文明异同论》；署名铁译、刊于《光华日报》1910年12月至次年3月的《新加坡中国人与日本人势力之比较》《长寿之方法》《世界社会党之现状》《中日未来战争论》和《生物界之分业》等。

九、作者笔名较多，撰作又散见海内外各刊，编者局于所见，且限于水平，遗漏错讹，实为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匡不逮。

十、本集编辑过程中，曾得到章开沅、汤志钧二师的鼓励和雷氏家人雷闻宇、徐晓初的支持，并得到姚伟、史革新、胡伟希、赵金钰、范明礼、杜春和，尤其是杨天石同志的热情帮助，上海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中宣部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等单位为编者搜集有关资料提供方便，四川省自贡市政府为本集出版慷慨资助，虞锡雄同志挥毫题签，对于他们，编者谨致至深的谢意。

前言

革命老人吴玉章在回忆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创办著名的《四川》杂志时，曾热情赞扬过一位共事的战友，称他的文章“畅达锋利，很受时人赞赏〔赏〕”，南洋女子陈璧君即因“仰慕”而专程赴日访求（《吴玉章回忆录》第46页）。这位文笔很有魅力也颇名重一时的宣传家，就是本集的作者雷铁崖。

雷铁崖（1873—1920）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酝酿准备、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他用深情的笔墨文字，吁求召唤革命，鞭挞反动势力，载下了自己对民主革命执着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破灭后的痛苦，从而从自身特定的角度反映了这场革命。应当说，辛亥革命活剧是由无数慷慨悲壮震撼心魄的动人情节结构而成的，是由无数忧国伤时怀抱激烈的志士仁人通力合演的。但当人们来追述它的时候，容量有限的现成史书却总只能载录历史舞台上主要角色的活动，次要角色的活动则略而不及或语焉不详。然而要求得对这场革命多面立体的深入了解，又非得在加深对前者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后者的探讨。正是本着这种愿望，编者纂辑了这本《雷铁崖集》，以敬献读者。

—

和同时代的许多先进中国人一样，雷铁崖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在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后，才奋然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出生在川南自流井一个风气相对闭塞而又家境中落的环境中，父兄以镛业为生，把读书兴业的希望寄之于他。然而，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随着外来侵略的加深，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爱国知识分

子的觉悟。到一九〇二年和一九〇三年时，集结在日本的一批爱国留学生，已开始运用自己的广长舌和生花笔，把万斛新思潮从东海彼岸源源掘回。四川首批留日学生寄回的《劝游学书》和青年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都在一九〇三年广泛传布于巴山蜀水间。雷铁厓自称，“壬寅癸卯间，激荡于新潮流，民族思想愈勃发不可遏”（《斥阳光》）。因而，在一九〇四年底，“一曲骊歌辞祖国”，他终于冲破家庭阻力，满怀着求道者的虔诚心愿东渡，“学得屠龙好身手，归来收拾旧山河”。

到达日本后，雷铁厓立即投身昂扬高涨的革命潮流之中。当时弥漫留学界中空前浓厚的民主革命氛围，使他未曾蒙受改良主义思想的浸润影响，从而径自进入了革命的中心。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也即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五天，他就由同乡同学后以偕同汪精卫刺摄政王而驰名的黄复生主盟加入，成为四川留学生中首批加入者。从此后，他就开始了文字鼓吹的革命生涯。同年九月，与本省留学生中的同盟会骨干邓絮、董修武（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曾任川省主盟人）、李肇甫（同盟会执事部书记科）等创办《鹃声》杂志。嗣因言论激烈，清吏惊恐，“侦探遍地，乡里咸惊，州县访拿，学堂尤烈（官皆直入学生书案搜索）”（死灰：《〈鹃声〉再兴发刊词》），二期后停刊。一九〇七年三月至五月间，再兴《鹃声》（有人认为《鹃声》创刊于一九〇六年，再兴则时间不详。此据雷氏自述及其文章考订）。同年六月，托名经商潜行返国，谋归川举事。到达汉口后大病，旋因川中义师失败复返日本。次年一月，与吴玉章等主办《四川》，积极撰稿鼓吹革命。一九〇九年七月，返沪任中国新公学等校教职，复因鼓吹革命为清吏指名捕拿，仓卒走杭州白云庵为僧。为僧时复为《越报》等刊物撰文，半年后返沪，以教育为名从事革命活动，并为《民声》主要撰稿者。

雷铁厓原字泽皆，后以“耆皆”为号，因为“耆有恐惧意，与姓可联络”（《正号》）。后复以音近，取铁厓为笔名。他之欲以雷霆之声震醒国人，用意甚明。遍聆他这阶段的鼓吹，响彻其间不绝于耳的，也始终是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两大基调。

著名的《警告全蜀》，洋洋洒洒文近二万字，历叙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本性、侵略政策和侵略手段，极陈神州大地已为列

强瓜分的“中心点”，天府之国也已成为列强竞争的“大战场”，中国人民面临“刀下之肉糜〔糜〕”和“枪下之血肉”的命运。而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披猖横行，那是同“盗钱政府”和“送礼政府”的腐朽统治分不开的。因此，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必须破除对政府、官吏和乡绅的“依赖病”，依靠爱国志士自身的力量达此目的。正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当深刻的认识基础上，他呼吁有志者慨然以中国的华盛顿和拿破仑自居，“舍身国事，百折不回”，为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不懈。

雷铁崖并未停留在上述政治批判，他还把自己的笔锋指向思想领域。《名说》一文堪称代表，它尖锐揭露封建纲常名教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杀人于无形”。文章指出，君为臣纲的名教谬说，助成了封建帝王敲剥脂膏恣意杀戮的暴虐统治，而夫为妻纲的名教谬说，又不知害死了多少妇女。作者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愤怒斥责那些制作名教邪说的“枭雄”和为之铺张扬厉、推波助澜的“无耻贱儒”，激烈宣称，恨不能焚尽彼等曲说，坑尽彼等迂儒。在辛亥时期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的文字中，这篇文章应该占有一定地位。

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文字相应，雷铁崖还针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及革命队伍中出现的某些思想倾向加以批评。

一九〇七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调子渐唱渐高。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梁一系组成政闻社，杨度一系则别组宪政公会，彼此呼应联合，而又互相攻讦，争坐立宪运动设计者和理论家的首席。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主阵地，一些主将纷纷把自己的火力主要集中在康、梁身上。雷铁崖则似乎有意布一犄角之势，专以杨度为对手，大张挞伐，不稍宽贷。杨度在《中国新报》上发表《金铁主义说》，大倡“政治革命”，主张用局部改良的办法来修补国事，雷铁崖则专作《主张政治革命之非》，力攻其谬。他强调腐败的清政府已经到了“大窳烂”的崩解地步，非用霹雳手段行种族革命之“大改革”不能济事，“政治革命”之谬误，就在于“有大窳烂用小改革”。杨度曾发挥梁启超的“满洲非国”和“中国不亡”论，认为东三省为明朝属地，满族实为与汉族异种而同国之人民，清之代明，犹汉之灭秦，唐之灭隋。雷铁崖复专作《中国已亡之铁案说》，力辩其非。他逐一辩驳，证明满族为异种异国之民，清之代明为中国已亡之“铁案”。作者在此发挥“排满革命”的意

趣，是为了宣传和发动群众，目的无可厚非，但在理论和史实方面则有失误。杨度还标榜自己先开国会的主张较梁启超笼统要求立宪的提法为优，自诩提挈住了立宪运动中“至重且大”的关键。雷铁厓则专作《中国立宪之观察和欧洲国会之根据》，力斥其妄。他指出，《钦定宪法大纲》的种种规定，都表明清政府立宪本意在于加强皇权，而毫无让出分毫权柄之心，因而纵使国会召开，也是徒然。杨度辈“佯狂奔走吁请号咷”，不过借以为博取仕禄之捷径，“宪政公会者，做官公会；金铁主义者，金钱主义”。预备立宪只是一种“狙公赋茅”的把戏，赋茅者刚刚宣布改朝三暮四为朝四暮三，“今之齿齷齪焉而思嚼者”便喜不自胜，可怜堂堂“谋国之士”，其见识连群狙也不如。

平情而论，以上文字并不难在当年革命派众多的宣传文章中读到。诸如有关“排满革命”论和“国民总意”说，有关“名”的虚实和有形无形问题，乃至模仿庄子式的文字，人们都不难从《民报》等刊所载中发现其绍述所本。它表明，雷铁厓唯革命派主将之马首是瞻，是自觉地奉行将令，前去克敌致果的。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他对革命队伍内部有关思想倾向所作的批评，是他当时思想独放异彩之处。

一九〇七年，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中颇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无政府主义。在东京以刘师培为首的《天义报》诸人和巴黎以吴稚晖为首的《新世纪》诸人，高张此说，一时之间颇成思潮。甚至连时任《民报》主编执革命派舆论之牛耳的章太炎也赞附此说，发表《五无论》，扬其波助其焰。对此情况，雷铁厓奋起以铁铮之名投寄《政府说》于《民报》，直劾其非。文章相应于《五无论》立意，从哲理和运会两方面落笔。从哲理上说，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都是大小有无相对而立，相倚而成的。“欲去政府，必有扑政府之能力”，而欲组织此能力，则实又转而自建一政府。所以要达到“五无”（无政府、无聚落、无人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之境，“必先生‘五有’，否则无操‘五无’之权而使之无者”。从运会来说，处今之世，“运会在有政府，即不容无政府者存也”。帝国主义群虎肆虐，“率以政府策厉其后”，倘我无政府，则以我涣散之人民当彼萃聚之政府，其后果不待筮卜。因而，无政府主义的过误即在于“藐运会而先之”，超越了不可躐等的历史发展阶段。主观愿望虽想否定满

政府，结果“适以巩固满政府”。建立在逻辑论证基础上的肯綮批评，使得被批评者特以“记者按”的形式在文末写下自己的感想：“论者主张太过，然亦适合今之事势。”这样的按语出诸素以执着孤傲著称的章太炎，也足以表明作者署名无愧铁中铮铮之意了。

众所周知，章太炎还曾热情鼓吹佛学，企图以之鼓舞革命者的斗志，激励革命者的道德。雷铁厓对此感应十分迅速，章太炎《建立宗教论》刚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发表，他随即在《中国已亡之铁案说》中作出反响，委婉然而却立场鲜明地指出：“处今日水深火热之中，枕戈待旦之日，其势有不可须臾缓者，而望此迂缓之学以收成效，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此岂非所谓待西江之水，已求我于枯鱼之肆乎？”随之引来的便是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答铁铮》。虽然这封公开信旨在辩白，并未接受批评，但它重申倡佛原因，澄清若干易致误解的说法，足以引起读者的深长思考，从而抉择取舍，这就不能不说是雷铁厓先发之功了。

孙中山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他把腐朽的清政府统治比作一座行将坠毁的破房子，号召人民奋起推翻它。雷铁厓深以其言为然，并专以涤荡旧屋的陈垢为要：“今之中国，已如大厦之将倾，非推去旧宇，重建鸿模，其何以历星霜而蔽风雨？欲谋今日之中国，必先涤尽旧日之陈朽，以改易社会之观念。”（《名说》）领袖登高一呼，骨干遂齐声响应，并以重建神州华夏为己任。于是百千万人大呼，曳屋许许，构成了一幅颇见声色壮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图景。在意识形态领域从事涤荡陈垢工作的那一部位，人们应能发现雷铁厓辛瘁劳作的身形。

二

一九一〇年秋，雷铁厓应胡汉民之邀实受孙中山之召，前往南洋槟榔屿筹组《光华日报》，随即主持该报笔政一年有余，从而进入一生文字鼓吹最见实效的时期。

槟榔屿为地处马来西亚马来亚地区西北部的一个小岛，面积二百八十平方公里，同马来半岛相隔一条不宽的海峡，居民绝大部分为中国血统的马来西亚人和闽广华侨。但就是这一弹丸之地却为辛亥革命作出过相当重要的贡献。了解孙中山历史的人都知道，自从一九〇七年他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后，同盟会工作的重心便移向南

洋，同盟会南洋支部所在的新加坡一时遂居有革命运动在东南亚地区指导中心的地位。可是随后因章太炎、陶成章等同孙中山之间的党内纠纷接连不断，新加坡分会部分领导人受此影响，该地革命活动渐处停顿状态。一九〇九年底，革命派在新加坡所建立的最大的书报社“开明演说书报社”关闭，次年夏，设在该地的南洋地区舆论重镇《中兴日报》停刊。鉴于如上情况，孙中山遂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将南洋支部迁往槟榔屿。槟榔屿的党人倾心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并且该地在地理上与孙中山倾力从事武装起义的华南地区比较接近，大量的华侨移民及其相当可观的财力，加以便捷的邮政通讯和银行汇兑，都使它具备了取代新加坡成为新的革命指导中心所必需的条件。于是，在该地创办一张报纸作为革命喉舌就成为十分急需的了。刚好这年夏天，设在仰光的同盟会缅甸分会机关刊物《光华报》，因受清领事的摧残停刊。槟榔屿党人遂沿用其名，重组新报，表现了彼仆此起，革命不止，永光中华的决心。雷铁崖也因之时乘势，进入了自己文字生涯的新阶段。

《光华日报》于当年十二月二日问世，摆在主编面前的任务十分明确：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需要南洋华侨提供足够的财力和人力，以继续支持在华南地区的武装起义。这就需要大造革命舆论，鼓动华侨出钱出力。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召开的那次著名的槟榔屿秘密会议，作出了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重大决定，这就使任务愈显紧迫。然而，要完成任务又非易事。这是因为康有为在此经营多年，厚植势力，华侨受惑者甚多。康有为自戊戌出亡以后，从一九〇〇年八月应英国新加坡总督之邀住居槟榔屿，到一九一〇年五月离此而迁居新加坡，十年之中，虽不断离此而去印度、欧美各地，但五去五返，始终以此为归宿。他住槟榔屿，短则月余，长则达十五月之久，累计十年中将达三十个月。长期坐镇于此，是为了争取华侨，筹集款项，与梁启超在日本的活动遥相呼应，以与革命派抗衡。孙中山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六日被槟榔屿当局以“妨碍地方治安”为由驱逐出境，即是康党活动的结果。即此可见，要从康有为卧榻之侧夺下这块舆论阵地，非经一场恶战不能奏功。

在本集中所见到的雷铁崖论战文章，是《光华日报》扫荡康党《槟城新报》的主体部分，借此可以窥知在辛亥革命前夕南洋地区的思想战线的大致情况。从实说来，双方论战不过是前几年以《民